

嘉庆《广西通志》所见柳宗元 佚诗《花石岩》再辨*

张廷银

提 要：见载于嘉庆《广西通志》的所谓柳宗元《花石岩》诗，不见于现存各柳宗元诗文集，因此曾一度被视为柳宗元的佚诗。但该说也遭到怀疑和否定，通过志书修纂、文献传播及柳宗元仕履几个方面的考察，可以进一步确定此诗乃后人伪托，而非柳宗元佚诗。这再次提醒我们：对于仅见于地方志的前代名人之作，一定要谨慎考辨，不可盲信。

关键词：嘉庆《广西通志》 柳宗元 花石岩

嘉庆《广西通志》卷97《山川略》记载，灌阳县北60里昭义关有花石岩，柳宗元曾游此，并录柳宗元诗：“忆昨筹戎事不同，曾闻燕集此岩中。军声孰与水声胜，虏势难争山势雄。葶略纵能亲朗日，安全还记慕遗风。我来忽动晏安志，为拂苍苔记隼功。”^①

按，此诗不见于柳宗元诗文集，亦不见于《全唐诗》。蒋芳生《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曾对此诗做过详细考辨。蒋芳生文章介绍，灌阳县先后在嘉靖、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间五次修纂县志，其中民国3年（1914）和33年各一次。嘉靖和民国33年县志已不存，现存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3年县志中皆收录柳宗元此诗。蒋芳生即据4部县志的记载、县志中明清人关于柳宗元《花石岩》石刻的题咏，再辅以当地人的讲述以及柳宗元在广西的行迹，肯定此诗为柳宗元之佚诗。^②但这个结论能不能成为定论，确实还需要进一步考论。

一 方志及石刻文献学的考察

嘉庆《广西通志》关于柳宗元曾在灌阳县昭义关花石岩停留的记载，注明出自《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卷83《桂林府》有“昭义关”，却无花石岩，更不见柳宗元及其《花石岩》诗。^③《大清一统志》卷461《桂林府》之“山川”，于“花石岩”记载：在灌阳县北六十里，唐柳宗元尝游此，有诗。^④但未录所作诗。可见嘉庆《广西通志》所说《一统志》即指《大清一统志》。明嘉靖《广西通志》“山川”不见关于花石岩的记载^⑤，雍正《广西通志》卷13“山川”对灌阳县花石岩的记载与《大清一统志》则完全相同^⑥，也许《大清一统志》的资料即取自雍正《广西通志》或其他暂时不详之文献。而雍正《广西通志》都未涉及境内的石刻，艺文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方志所见文学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8）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谢启昆修，胡虔纂：嘉庆《广西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影印，第1263页。

② 参见蒋芳生：《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2期。

③ 参见《大明一统志》卷83《桂林府》，明天顺五年（1461）内府刻本。

④ 参见《大清一统志》卷461《桂林府》，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活字印本。

⑤ 参见黄佐撰：嘉靖《广西通志》，明嘉靖刻本。

⑥ 参见金拱修，钱元昌纂：雍正《广西通志》卷13《山川》，清雍正刻本。

部分则只字未提柳宗元《花石岩》诗；嘉庆《广西通志》虽也有《金石略》和《艺文略》，但该二略却都没有关于柳宗元《花石岩》石刻的记载，也没有另外录载此诗。又查康熙《灌阳县志》卷1《山川》有花石岩^①，记载与《大清一统志》及雍正《广西通志》、嘉庆《广西通志》一致，其卷10又收录了柳宗元此《花石岩》诗。因此我们推断，嘉庆《广西通志》柳宗元曾游花石岩的资料来自《嘉庆一统志》，柳宗元全诗则可能取自康熙《灌阳县志》。蒋芳生《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称，历代灌阳县志收录花石岩访柳子厚石刻诗篇13首，其中康熙十九年（1680）灌阳绅士唐绍容所作《花石岩避寇》有云：“千寻峭壁中藏窟，柳子题名花石岩。今日筹戎非昔日，水声山势落平凡。”此与柳宗元原诗中“忆昨筹戎事不同”“军声孰与水声胜”遥相呼应，看来唐绍容当年已经知道柳宗元此诗，并且“千寻峭壁中藏窟，柳子题名花石岩”似乎也告诉我们，唐绍容当时在花石岩就看到了刻有柳宗元此诗的题迹。可是为什么嘉庆《广西通志》却只字不提花石岩以及柳宗元的诗作，嘉庆《广西通志》虽然有花石岩和柳宗元的诗，但《金石略》《艺文略》里又不见记载。主持编修嘉庆《广西通志》的广西巡抚谢启昆，曾经下令各郡、县广为访求境内金石文字，拓摹于纸上送呈，受聘担任《广西通志》总纂的安徽学者胡虔同时出任总编校，与《广西通志》同时而成《粤西金石略》。该书收录自晋至元金石资料共480余种，当然远不能囊括广西境内的全部金石材料。不过，无论是谢启昆还是胡虔，都不可能不知道柳宗元此诗的意义，如果已经知道存在此诗，且有石刻，一般来说不可能不尽力去搜访并予以著录。蒋芳生《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说他自己未能亲自去花石岩进行勘访，但根据几位当地人的介绍，确曾看到过刻有柳宗元《花石岩》的石刻。如果他们的讲述无误，就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撰纂嘉庆《广西通志》的黄佐以及修纂嘉庆《广西通志》的谢启昆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柳宗元《花石岩》石刻的价值，二是在黄佐以及谢启昆、胡虔时代尚未有此石刻，后来人根据有关资料甚或传说，补刻了此石。总之，从石刻文献学的角度，柳宗元《花石岩》的真实性还难以断定。

二 文献传播学的考察

根据蒋芳生《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的研究，柳宗元《花石岩》诗既不见于柳诗文集，亦不见于《全唐诗》。柳宗元集从唐代刘禹锡开始就进行编辑，但这个柳宗元集子谁也没有见过，不知道有没有《花石岩》一诗。从南宋编刻的《柳州旧本河东先生集》《柳州集》开始到清代，柳宗元的集子前后出现过10多种，根据蒋芳生的研究，似乎都没有发现有《花石岩》。蒋芳生之所以认为这是柳宗元的佚诗，主要就是根据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余福州《柳宗元在灌阳写了花石岩诗吗？》也从文献传播的角度，否定了曾经存在过柳宗元《花石岩》的可能性。其根据有三点：其一，明代全州知州顾璘曾专程到灌阳去寻访柳子遗迹凭吊这位前贤伟人，但他只到了灌阳的仙源洞，写了仙源洞寻访柳子诗三首，丝毫没有寻访花石岩及柳宗元《花石岩》诗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到明代顾璘时，还没有柳宗元《花石岩》诗，其出现可能在明顾璘之后，多半在康熙年前的清初；而在康熙年前可能流传了所说的柳子花石岩诗，但没有刻于岩壁一说，所以康熙版县志在舆地卷的花石岩的注释上只写“柳子厚曾游此，有诗”，并没有写“诗刻于岩壁”，因此也就没有康熙年前有人寻访花石岩诗的记载。其二，康熙、道光间先后纂修的《灌阳县志》中出现了乾隆、嘉庆至道光13位诗人写的14首寻访花石岩石刻的诗。但这些作者多数是灌阳本地人士，而且他们看到的石刻上到底是什么内

^① 参见单此藩修，蒋学元、陈廷藩纂：《康熙灌阳县志》，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19年（1930）抄本。

容，大都因为“岁久怅剥落，隐隐龙蛇姿”，没有给出明确的描述。其三，清代13位写过寻访花石岩石刻的诗人之一蒋卜德其实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怀疑。蒋卜德在相约几位朋友一起探寻花石岩后留下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沧桑世几变，蛇蚓姿半蚀。为谁铭隼功，徒尔对陈迹。”意思是年久字迹不清，不明白石刻诗记述的内容，只能空对这历史的遗迹。另一首则明确地表明了怀疑：“且复凌绝顶，西首望罗池。片石柳韩陵，视此无愧辞。浯溪更南望，亦有摩崖碑。厥功与厥颂，元气何淋漓。此诗置柳集，令我独孤疑。或谓且阙疑，与子携手归。”^①

蒋芳生的文章虽然也使用了一些书籍文献资料，但也大量采信一些道听途说，相比而言，余福州的文章从历史文献中寻找证据，似乎显得更可靠一些。

三 柳宗元写《花石岩》的现实可能性

关于柳宗元写作《花石岩》的可能性，蒋芳生《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也做了一些推论：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在永州谪居10年之久。在此期间，柳宗元的足迹几乎遍及永州全境。唐代永州辖零陵、祁阳、湘源（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灌阳4县，柳宗元又是司马，是有可能也有责任到过灌阳县以及灌阳县内花石岩的。至于《花石岩》诗里所说“忆昨筹戎”之事，蒋文引柳宗元《武冈铭并序》“元和七年，黔巫东鄙，蛮獠杂扰，盗弄库兵，贼胁守帅，南钩牂牁，外诱西原，置魁立帅，杀牲盟誓，洞窟林麓，啸呼成群。皇帝下铜兽符，发庸、蜀、荆、汉、南越、东瓯之师，四面讨问”，证明柳宗元为了配合政府平息这场少数民族起义，而前往作为永州门户的灌阳昭义关去“筹戎”，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的是，如此重要的事件和活动，为什么在柳宗元的其他诗文中未见任何记载，这有点不合常理。而且《花石岩》诗中的描写也与蒋文的推断不尽相符。“忆昨筹戎”，说明此事已经发生有些时间了，如果按照蒋文所说，此诗写于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筹戎”又指元和七年（812）黔桂交界地方少数民族起义，实际上给柳宗元留下的可以称为“昨”的时间并不充分，柳宗元一定对“昨”“昔”这些时间概念非常清楚，不会随便使用的。史载柳宗元于元和十年二月由永州回到长安，但没有受到重用，被改任柳州刺史，旋即于当年三月由长安到柳州，一直到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逝于柳州。就“昨”这个时间点来说，比较合理的应该是柳宗元任柳州司马时寻访昭义关并写下了《花石岩》。但这依然只是推测，没有任何史实依据。

进一步看，这首《花石岩》的不清晰、不周密处还有不少。第二句“曾闻燕集此岩中”，这又指什么事？说谁呢？指诗人自己，于情不通；指别人，则未曾闻听。柳宗元不应该写这么一句让人无法理解的诗。下面“葶略纵能亲朗日，安全还记慕遗风”，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剩下几句，“军声孰与水声胜，虏势难争山势雄”，意思倒也清楚，但缺乏意境，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来忽动晏安志，为拂苍苔记隼功”，交代了写诗及刻诗的动机，但反而降低了诗歌的境界，晏安之志本是古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正常心志，柳宗元却只有到了此地才瞬间萌生，恐怕没有这样坦陈表露自己心迹的吧！总体上说，这首《花石岩》表达很不清楚，首先就不符合诗歌表情达意的最基本要求；意境低迷，缺乏诗歌应有的超越和提升精神。

所以，笔者认为柳宗元这首《花石岩》最有可能是出自当地文人的伪托。而且，伪托的历史也不会太早，大概就是康熙到嘉庆之间。伪托柳宗元佚文的现象并不鲜见，前些年吵得沸沸扬

^① 参见余福州：《柳宗元在灌阳写了花石岩诗吗？》，《桂林日报》2008年7月18日，第7版。

扬的所谓柳宗元佚文《谱牒论》，就被证明纯粹是伪托之作。至于蒋文所说《花石岩》是否为柳宗元亲笔所书，这就更难判断了。嘉庆《广西通志》卷229《金石略》记载在贵县分别有苏轼所书“南涧”“井栏”“莲巢亭”，但志书的编者所加按语云：“东坡谪海外，取道藤、郁，无由至贵。以上三刻或好事者摹刻苏迹于此。”^①说明明代以来广西各地随意摹刻、伪托前人笔迹的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存在《花石岩》之石刻，很有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蒋芳生一再说明由于条件所限，未能亲勘花石岩的石刻。如果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先把花石岩上的各个石刻调查一遍，就可以解决《花石岩》的许多问题，至少可以回答到底有没有《花石岩》的石刻，进一步很可能初步判断大致刻于什么时间。

余 论

地方志作为一种以记录地方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为内容的特殊文献，确实保留了许多不见于一般典籍的资料，是诗文辑佚的重要渠道。有学者就说：“地方志又是我们搜集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史的重要资料，许多诗文不见于作家别集，却保存在地方志中。编纂宋、元、明、清历朝诗文集，地方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②陈尚君主持的《全唐诗续拾》共收逸诗四千三百余首，其中不少即出自地方志。其所撰《诗人张又新的人品、作品与佚失诗》就指出：“张又新的上述诗作，大多靠温州地方文献保存，目前仅见于明清方志中，其来源应该可以追溯到今已失传的宋元方志。由于地方文献有逐次修志的传统，后出地方志可能保存前代志书的内容，即便仅见于晚出地志，仍不能轻易怀疑。”^③

但由于地方文化本身情况比较复杂，再加上编纂地方志时的乡邦情结、审察不精等因素，难免会混入一些伪托之作。因此，就需要仔细考辨，至少不能盲目采信。曾有学者整理《陆士衡文集》时，从《钦定热河志》中辑了陆机的一首佚诗《赠弟士龙》，整理者还加了解题云：“此为士衡与弟离别之作。兄弟卒然离别，内心充满伤情，虽互相劝慰，然临歧别去，仍别情难禁。……诗作时间不详，然诗有‘卒然当远别’之句……悲悼伤感之情如此深厚，当作于太安元年之别也。”^④但陈尚君《何来陆机佚诗》考证认为，此诗乃乾隆皇帝模仿江淹《杂拟》三十首之例所作拟诗中的一首，整理者失察，竟将其误以为陆机的佚诗。^⑤收于嘉庆《广西通志》的这首柳宗元“佚诗”其实也可能是这种情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嘉庆《广西通志》卷229《金石略》，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影印，第2828页。

②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第346页。

③ 陈尚君：《诗人张又新的人品、作品与佚失诗》，《文史知识》2018年1期。

④ 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江苏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188页。

⑤ 参见陈尚君：《何来陆机佚诗》，《东方早报》2009年4月12日，第B12版。